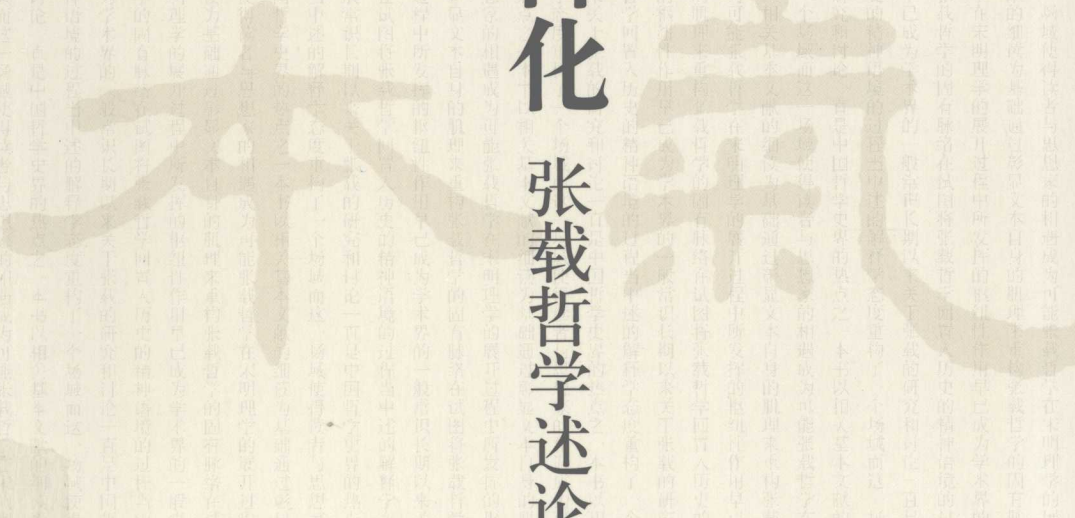


杨立华 著

气本与神化

张载哲学述论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本书以引文法本文献的细读为基础，通过对其著作《正蒙》中“气本”与“神化”思想的深入探讨，揭示了张载哲学的独特性。本书认为，张载的哲学思想，不仅是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人生观。他提出的“气本论”，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皆由气而生。这种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理本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张载还提出了“神化”的概念，认为神是气的运动变化，是万物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对后世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和讨论，旨在揭示张载哲学的思想内涵，为理解中国哲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本书以引文法本文献的细读为基础，通过对其著作《正蒙》中“气本”与“神化”思想的深入探讨，揭示了张载哲学的独特性。本书认为，张载的哲学思想，不仅是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人生观。他提出的“气本论”，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皆由气而生。这种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理本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张载还提出了“神化”的概念，认为神是气的运动变化，是万物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对后世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和讨论，旨在揭示张载哲学的思想内涵，为理解中国哲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杨立华 著

气本与神化

张载哲学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杨立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301-14420-6

I. 气… II. 杨… III. 张载(1020—1077)—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664 号

书 名: 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

著作责任者: 杨立华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420-6/B·076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07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张载的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以来,受到学者的相当重视。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写出了先秦部分,故对于宋元明清的道学或理学全未涉及。其实,以胡适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他也不大可能对道学或理学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代初期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此书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全面超越了胡书,其原因固然是冯书完整地叙述了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哲学史,更主要的则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详于文字的考证训诂和历史境况的介绍,对文字所表达的哲学义理体会较浅,而冯书不重文字的训诂考证及相关的历史背景,特重于哲学义理的了解体会。

冯书下卷在“张横渠及二程”一章中提出,横渠思想从《易》推衍而来,横渠所谓太和,是指包括野马、尘埃在内的气之全体而言;在其散而未聚之状态中,此气即所谓太虚。“吾人所见空若无物的太虚,实非无物,不过气散而未聚耳,无所谓无也。”张岱年先生于1930年代后期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对横渠之学尤为重视,他认为中国哲学中有唯气的本根论,即以气为万物的本根,横渠乃为此说之集大成者。他主张“张子的宇宙本根论中,最根本的观念有四,即气、太和、太虚、性。太和即阴阳会冲未分之气,太虚即气散而未聚无形可见之原始状态,性即气之固有之能动的本性”。他还指出张子哲学中次根本的观念亦有四,即道、天、易、理,“张子所谓道指存在历程或变化历程,天即太虚之别名,

易即道之别谓，气之屈伸变化有其规律，是谓理”。张先生对张载哲学主要概念的理解，与冯先生基本一致，而在冯先生《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此外，在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特别提及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也在“天人合一”一章中论述横渠此说，说明两位先生在重视横渠的宇宙论的同时，也未忽视其为学境界。冯先生、张先生 30 年代对张载哲学的理解和分析，清楚平实，后来得到哲学史学界的广泛认同，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这些阐明，是在学术研究还很少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境况下作出的研究，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20 世纪的大半时间，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哲学的内容和分派为参照，50 年代至 70 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僵化的唯心、唯物二分的哲学史观，凭借政治与意识形态强力推行于学界，引起许多怀疑和不满。这些研究方法和立场对张载研究的影响，除了偏重于强调其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外，主要是忽视了张载是一个儒学思想家、道学思想家，忽视或贬低张载在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上对新儒家哲学思想所作的贡献。有幸的是，自 1970 年代末以来，上述情形已经渐渐改观。一个在宇宙论上主张唯气的本根论、主张气为宇宙根本实在的哲学家，可以同时是道学的思想家和奠基者，这样的看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对张载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向着更开放、更丰富的认识发展。冯友兰先生晚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立专章“道学的奠基者张载”便是明显的例子。尽管冯先生仍然肯定张载发挥了唯物主义的有无混一说，但冯先生论述的重点已经转向“张载的《西铭》与人的精神境界”、“《正蒙》的《大心篇》与为学之方”、“《正蒙》的《诚明篇》与为学之方”。即使在“发挥唯物主义有无混一说”一节里，冯先生也更突出“太和”的观念，他说：“太虚是张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张载都讲得很清楚，还有太和这个范畴，其重要性不亚于太虚。《正蒙》的第一条就是讲太和，而不是讲太虚。”冯先生认为“太虚”说的是宇宙的物质结构，“太和”说的是宇宙的正常状态和精神面貌。由于对“太和”的重视，冯先生特别表扬其“仇必和而

解”的思想。冯先生还在《新编》的全书总结中再次强调了张载的“太和”观念的重要性。

流行于 50—70 年代的教条主义的哲学史观虽然没有根本影响对张载哲学的较高评价,但因偏重强调其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也引发了一些反弹。一方面反理学的研究者始终对于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桂冠”戴在张载头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新儒家学者也多不能接受把道学思想家张载仅仅视为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而,这两方面的学者都从张载哲学中多义而费解的“神”的观念入手提出对张载哲学的不同解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如陈荣捷、张君勱、劳思光,虽然也反对此种教条主义哲学史观,但并不就因此而改变对张载气本论的论定。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模式及其反弹,返回到 30 年代平实的理解,应该说更接近张载哲学思想的特质。比如张载“太虚即气”的说法,孤立地看此四字,固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置于其上下文中,其义自见:“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即气”的意义是由前一句“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和后一句“则无无”所规定了的。故“太虚即气”的意义即是指气与太虚的关系犹如冰与水的关系,所谓“气之本体”的意义亦由此冰水之喻可见;而肯定太虚即气,其目的乃是为了彻底在宇宙和人生上反对“无”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强调虚空不是虚无,无形的虚空仍然是气的实在。因此,张载的太虚即气说或虚空即气说所针对的乃是以无为本的世界观,在他看来,为了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必先确定宇宙为实有,才能肯定人生、伦理、人性和价值的实有。唯气的宇宙论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唯心思想,而是虚无主义的宇宙论和世界观。

张载如何既是唯气论的哲学家又同时是道学的创始者,这样的问题在宋明时代是不会提出来的,这是近代以来西洋哲学输入而成为哲学的主导典范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发问。这里的问题关联着“哲学”和“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理解。在西洋古代和近代的“哲学”的观念里,一个哲学家的宇宙论或本体论往往被视为其哲学思想的根本,并以

此确定其哲学的性质及其所属的哲学流派。但是“中国哲学”即中国哲学思想的实际发展中,思想的派别归属与分际并不是主要以其自然哲学为标准,而多是以价值、伦理、人生观,甚至社会思想为分别的标准,宇宙论毋宁是其社会、人生观的论证。自然,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并非只是中国思想中合于西方哲学的部分,而是中国古代对天道性命思考的全体及其条理。因此,在中国哲学中,对同一价值体系往往有不同的哲学论证,以回应不同时代的各种挑战,这种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的结构特色在旧有的范式下是无法了解和确定的。以往发生的讨论,如讲阴阳刚柔的《易传》是否为道家,气本论的张载是否为道学,主气的罗钦顺是否为朱子学,重气的刘宗周是否为心学,都与这一问题的混淆有关。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来脉络中,自成其条理,所谓儒家、道家、道学、理学、心学,都是其本然的条理分别,而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流派划分。全面了解气论与儒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

关于气论哲学本身,近二十年来,由于我们厌倦了单纯以唯物主义了解气论的范式,于是气论的研究渐渐衰弱,这其实也是片面的,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视野复兴对气论哲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以上所说,是借此机会,简略地谈谈我对张载哲学研究的一点个人认识。立华自博士毕业至今,已经十年,他自留校工作以后,即转向北宋儒学的研究,他在撰写北宋儒学史外,尤用心于张载的研究。在这十年中,他的学问用功,可谓中西兼修,在现代西方哲学原著精读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在哲学分析的深细度上有了明显提高。从立华此书可见,他的研究以文本的细读和正解为基础,着力于哲学概念的分析,颇见哲学分析的深度;而他对张载哲学的分析又和对价值的关注联接在一起,与他对北宋儒学复兴的理解相互联通。我读过书稿之后,感到此书态度平正,其讨论多能深入于以往学界不太注意的概念,时有心得,而不轻与前辈雷同,是我国张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成果,很值得向读者推荐。我相信,读者读过此书之后,对其文本分析的精细,

思想观照的多面性,论述的理论素养,必皆有深刻的印象。我也期待立华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陈 来

2008年5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陈来/1

导论/1

一 北宋立国基础中的畏与忧/1

二 历史鉴戒与疑忌之心/5

三 变法与党争/7

四 《左传》与《周官》/9

五 风俗与道德/13

第一章 传略/17

一 生平/17

二 志趣与情性/19

三 道学交游/22

第二章 虚与气/27

一 论形/27

二 论象/31

三 参两/34

四 虚与气/36

五 兼体无累/43

六 生死/45

第三章 神与化/51

一 论化/51

- 二 论神/55
- 三 神与化/59
- 四 神化与虚实/62
- 五 小结/65
- 第四章 太和/68**
 - 一 理/68
 - 二 诚/71
 - 三 道/75
 - 四 小结/77
- 第五章 物理/79**
 - 一 阴阳/80
 - 二 众理/82
 - 三 物怪/87
- 第六章 感与性/90**
 - 一 物与感/90
 - 二 感与通/94
 - 三 感与性/97
 - 四 圣人用感/101
 - 五 余论/103
- 第七章 心与性/105**
 - 一 论性/105
 - 二 论心/115
 - 三 心与知/118
 - 四 文字与心/122
- 第八章 成性/126**
 - 一 大与化/127
 - 二 变化气质与虚心/129
 - 三 弘大与谨敬/132
 - 四 自诚明与自明诚/135

五	穷理/137
六	博文约礼/138
第九章	礼乐/142
一	熙宁变法与“王政之事”/143
二	井田与封建/145
三	礼乐/152
第十章	大易/161
一	《横渠易说》的成书年代/162
二	释《易》体例/165
三	大《易》归旨/170
四	《易》学哲学/173
五	《易》道中的政治哲学/178
附录一	卦序与时义：程颐对王弼释《易》体例的超越/183
一	卦才/184
二	卦序与时义/188
三	释爻/195
四	政治哲学/198
五	结论/202
附录二	论宋学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
——	从韩、李异同说起/204
一	救赎与觉世/205
二	思想组合的有限性及其禁欲的归趣/213
三	结语/223
参考文献	/225

导 论

北宋立国基础中的畏与忧

历史鉴戒与疑忌之心

变法与党争

《左传》与《周官》

风俗与道德

北宋王朝的建立,终于结束了晚唐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乱局。在劫余的残烬中,颓弊已极的中国文化竟能在短时间内重放异彩,堪称文化史上的奇迹。在论及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而这一文化和精神高度就体现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凝塑出北宋的士大夫精神以及以此精神高度为基础的精神绽开,是值得深思的。

一 北宋立国基础中的畏与忧

对于北宋文化兴起的原因,邓广铭归结为如下四点:其一,是经济

^①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页245。

的因素，“士族地主势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其二，是技术的因素，“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日益普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到宋初，大部头的儒书和佛道典籍都能结集刊行，则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通俗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其三，是科举制度的影响；其四，则是文化政策的作用，“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①而北宋文化的兴盛即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外缘性的因素无疑与北宋文化的兴起以及士大夫精神的自觉有密切的关联，但此种外缘性要素要造成某种内在的精神展开，必须以某种一贯的精神趋向为枢纽。换言之，正是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趋向，才使得这些杂多的外缘性要素转化为单质性的力的关系，进而凝塑积淀为内在精神世界的提升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和思想成就。

北宋立国的根基是极其薄弱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有过深入的讨论：“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底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阝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②以如此弱勢奄有天下，何以遂能结束残唐五代以来的乱局，是宋史开篇就埋下的

^①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页66—70。

^②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4月，页1。《涑水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可为太祖根基之弱的佐证：“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去。”宋太祖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上无商、周、汉、唐之功德，下无曹魏、刘宋之奠基，一旦处身危疑之地，其惧可知。

谜题。

对于这一谜题，王夫之给出了颇具精神史意味的解答：恰恰是由于其无可恃之功德权望，故能始终不失其畏惧之心：

乃宋祖则幸非其人矣。以亲，则非李嗣源之为养子，石敬瑭之为爱婿也；以位，则非如石、刘、郭氏之秉钺专征，据严邑而统重兵也；以权，则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内无赞成之谋，外无捍御之劳，如嗣源、敬瑭、知远、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夺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俦侣也；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与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辅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敌国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寢衰寢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①

因畏惧而有所不敢，因有所不敢而恭俭慈和，如此日滋月长，终将残唐以来百余年的“嚣陵噬搏”之气消于无形。以畏惧之心为基础的宽容精神，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空前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空间。^②

然而，宽容精神本身并不必然引生出士大夫严毅的精神气质和自觉的承担意识。有的时候，一种优容的氛围反而会滋生出浮妄恣肆的士风。^③ 宋代的“养士”之所以能产生出那样积极的效果，与宋初科举

① 《宋论》，页3。

② 顾炎武在论及“宋朝家法”时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日知录》卷十五）“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作为誓约被刻石藏于太庙，是宋代帝王世世相承的准则，参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③ 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时代的士阶层，几乎掌握了所有的社会优势。但这种优裕的环境，非但没有培养出士大夫的承担意识，反而助长了当时虚浮的士风。

取士中的精神提点方向有莫大的关联。《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二淳化三年(992年)条有这样的记载：

治赐新及第进士及诸科贡举人《儒行篇》各一轴，令至所着于壁，以代座右之诫。^①

与《大学》、《中庸》一样，《儒行篇》也是《礼记》中的篇章。而《儒行篇》的特质，在儒家典籍中可谓迥出：“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独《儒行》记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②《儒行篇》对于“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博不程其勇”等特立自强的气质的格外强调，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范本。宋太宗以《儒行篇》赐新及第进士的创举，对于北宋士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史·范仲淹传》云：“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③这段话里的“易衣而出”，便是出自《儒行篇》。作为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集中体现，范仲淹的立身行事中处处可以看到《儒行篇》的深刻影响。

北宋士大夫所特有的严毅的精神气质和自觉的承担意识，凝聚为无往而不在的“忧”世情怀。而正是这一根本的精神趣向，引领北宋士大夫深入到其所处时代的真实历史处境当中，将各种现实的力的冲突熔锻成为饱满的文化和精神成就。事实上，在所有的精神方向上，我们都能触摸到这一根本的精神趣向的印迹：惟其忧积弱之时局，故能详于天下国家之利病，而有种种变革的企图和构想；惟其忧道德之不振，故能深于礼俗之兴弊，而对释老的蠹蚀有深刻的醒觉；惟其忧华夷之淆乱，故欲为中国之固有生活方式立一形上学基础；惟其忧价值之沦亡，故欲于六经中找寻重构价值信念的泉源。正是这个“忧”，引领历史主

① 转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页87。

② 章太炎：《馧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页140。

③ 《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页10267—10268。

体深入其时代的困境,使得时代的种种有形的困扰实实在在地撞入他们无形的精神世界,并进而凝结为真正的思想和文化上的问题,凝结为种种精神上的创造和积累。

二 历史鉴戒与疑忌之心

北宋的立国基础中的畏惧之心,既是其政治文化中的宽容精神的根源,也成为滋生疑忌之心的土壤。秦以后千余年郡县制国家的历史,使得郡县制国家运作的种种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种权力关系的特性以及其中蕴涵的危险,通过历史叙述凝结为取向迥异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作为历史鉴戒,在北宋的政治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影响。而畏惧之心则将历史鉴戒中的各种潜在的危险放大为实实在在的威胁,从而使疑忌之心浸透在北宋的种种制度考量当中。如何在各种现实的力量之间构建一种约制和平衡的关系,是北宋立国的政治理念基础。

在官僚机构的设制和权力安排上,“以竭力缩小官僚机构和官员的权力”为特征。这首先体现为对宰相分权的制度设置。宰相不再具有前代那样无所不统的威权:“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在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它和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对掌大政’,号称‘二府’。财政权归于三司,宰相亦不得干预。就是剩有的事权,亦往往设几个宰相和参知政事(副相)共同执掌。”其次体现在地方权力的制衡当中。比如通判的设置,即在于分地方长吏之权。在军事方面,鉴于唐代藩镇制度的教训,北宋制定了“内外相维”的制衡政策:将全部兵力配备于京畿和其他各地,各占二分之一,“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①。而对于统兵的将帅,也有种种限制:首先,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分掌禁军;其次,发兵之权统归枢密院掌管,从而使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再次,统兵将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年3月,页7883。

帅无独力指挥军事之权，无擅自处置部将之权，甚至不得收养亲兵以为“腹心”。^① 这些制度上的创设，对于结束残唐五代篡乱相仍的扰攘局面、维持国家的内部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其负面的影响，比如在地方和中央行政中各种职权之间的相互掣肘、军事指挥上的协调性和机动性的缺失等等。这些负面的影响，随着北宋王朝立国日久而渐成积弊。^②

而在各种权力制衡的关系当中，宰相与台谏的对立对于北宋士风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议论：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弹而不退。^③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是在明道二年（1033年）。至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即因批评时相吕夷简被遣，朋党之论随之而兴。^④ 仁宗的这一创制，与朋党的兴起之间的关联是显见的。

① 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页15—17。

② 当然，职责界划的不明确，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职责不清，所以需要有一部分士大夫充分调动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无疑对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③ 王夫之：《宋论》，页92。

④ 关于范仲淹此次落职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忌恶之。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卷一百一十八）考范仲淹明道二年以前的论奏，其锋芒往往指向帝后，而此后的奏议率多针对宰执。从中可以略见谏官职责内涵的深刻变化。